

形象史學研究

2012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 编



 人民出版社

形象史學研究

2012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 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形象史学研究（2012）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文化史研究室编. --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ISBN 978-7-01-011499-6

I. ①形… II. ①中… III. ①文化史—中国—文集
IV. ①K2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80001号

形象史学研究（2012）

XINGXIANG SHIXUE YANJIU (2012)

编 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陈鹏鸣 杜艳茹

出版发行：人 民 出 版 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门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100706

印 刷：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2年11月 第1版

印 次：2012年11月 第1次印刷

开 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20.5

字 数：370千字

书 号：ISBN 978-7-01-011499-6

定 价：45.00元

发行电话：(010) 65257256 65245857 65276861

销售中心：(010) 65250042 65273937 6528953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形象史学研究》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卜宪群 王震中 王 勇 王育成 王 艺 孙 晓

扬之水 刘荣军 刘明杉 刘中玉 刘永霞 张先堂

杨 珍 杨宝玉 沈冬梅 周安平 赵连赏 胡振宇

柴剑虹 楼 劲

主 编 杨宝玉 刘中玉

副主编 王 艺 刘明杉 刘永霞

前 言

“形象史学”，是指把形与象作为主要材料，用以研究历史的一门学问。

具体来说，指运用传世的岩画、铭刻、造像、器具、建筑、服饰、字画、文书、典籍等一切实物，作为主要证据，并结合文献来综合考察历史的一种新的史学研究模式。也许这可以成为继王国维二重证据（传统文献、出土文献）法、第三重证据（口头传播）法之后的一种新的方法。

就历史研究本身来说，我们所说的“形象史学”，不同于艺术史研究中侧重于符号学或阐释学的图像分析法，也不同于一般的历史图像著录。此外，它与西方史学界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兴起的“图像证史”也有区别，即不是把历史形象作为唯一的证据运用到历史研究中，而是对形象的生产领域、传播途径、社会功能等进行综合性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把形象与传统文献、口头传播等联结起来，构筑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藉以探讨中国文化演进的基本脉络。由此来看，“形象史学”既非局限于分析形象本身的文化与历史意义，又超越了传统精英文化史学的范畴，具有一定的包容性与拓展性。

就历史研究成果的表述来说，大量有形有图史料的应用，也可以更清晰地阐释研究者的思路与心得；而一般读者，也更容易接受和理解。“形象史学”，作为一种新的史学研究模式的提出，抑或可以将其视为中国文化史研究理论体系构建的一次创新，一次尝试。我们希望通过创办《形象史学研究》，来对这一新的研究模式进行不断的探讨和实践，以确定“形象史学”具体的学科范围，构建新的文化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



目 录

前言	1
----------	---

专题论文

青铜器夔纹与器形的对应性研究/苏辉	3
商周铜器双身龙纹图像辨析/张翀	15
汉画像中的免冠叩拜图/马怡	25
《洞玄灵宝真灵位业图》研究/刘永霞	39
唐人宴饮程序概观 ——以《游仙窟》为中心/高启安	57
陆羽《茶经》的历史影响与意义/沈冬梅	75
唐五代宋初敦煌女性出家申请的审批/杨宝玉	93
试探敦煌佛教理想世界中的衣食住行/胡同庆	105
蒙元前期佛道之争下全真教图像志的建构/刘中玉	119
赐服在明代的作用与影响/赵连赏	135
从项元汴的鉴藏生涯看晚明社会的收藏世情/刘明杉	147
乾隆朝宫廷纪实花鸟走兽画研究/郑艳	179
试论规矩的符号化和神秘化/董涛	207
《白蛇传》故事探源/王艺	217
浙南蓝夹纈考察报告/张琴	231
《中国文化史稿》读后/胡振宇	245

域外汉籍

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周欣平 ...	257
中山大学图书馆藏域外汉籍书志(一)/中山大学图书馆特藏部	267
项羽在国外	
——域外汉籍中有关项羽的文献记录/赵凯	283
试论《高丽藏》初刻本与《开宝藏》相关问题/翟金明 孙晓	301
高岛千春《舞乐图》读后/范慧华	311
《形象史学研究》2013 年约稿启事	317
《形象史学研究(2011)》目录	319

专题论文

青铜器夔纹与器形的对应性研究

苏 辉

纹饰与器形是青铜器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两个因素，以往大多针对其中一项进行深入的解析，讨论二者之间的关联、组合的成果较少。对于纹饰与器形的关系，以夔纹为例，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的问题：（1）同一种夔纹的细微变化与装饰的器形相关；（2）不同类型的夔纹与器形的关联；（3）夔纹与其他纹饰在装饰器用上的对应。

第三个方面，可以举出一个较为明显的例子：1978 年扶风齐家村 M19 出土 12 件铜礼器，以及仿铜陶礼器 11 件，其中酒器均装饰披冠顾首夔纹，食、水器则都是分尾鸟纹^①。（参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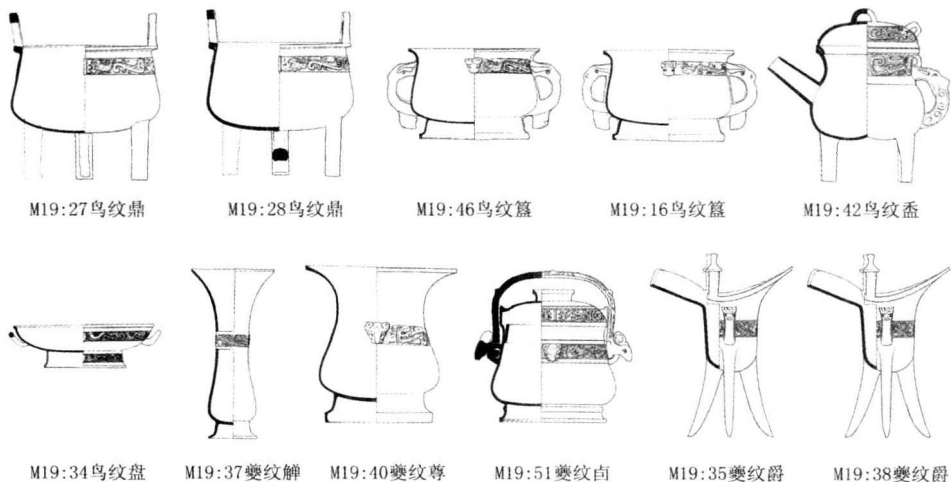


图 1 1978 年扶风齐家村 M19 出土青铜器

两鼎铭文均为“作旅鼎”，两簋铭文也一样，都是“作旅簋”，尊和卣铭文则

^① 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扶风齐家十九号西周墓》，《文物》1979 年第 11 期。本文所用此墓青铜器线图采自《周原出土青铜器》第 8 册，巴蜀书社，2005 年版。

全是“作宝尊彝”，其余各器无铭文。器物组合并不全同于常规，结合铭文考虑，酒器和食、水器可能不是同一批的产物，但被集中收在此墓中，以夔纹和鸟纹分别对应不同的器用。这应该说是有目的性的，既有便于摆设标示的考虑，还有礼制思想的含义。《礼记·郊特牲》：“凡饮，养阳气也；凡食，养阴气也。”阴阳之义，判然有别，揆诸纹饰，可以说也是丝丝入扣。至于第一个方面的问题，绝佳例子是匿侯盂、鲜簋等器表的顾首夔纹，上唇獠牙的形状大小与其装饰的器类有对应关系，笔者也已有讨论^①，此不赘述。下面主要讨论有关第二方面的夔纹铜器。

一 分裆鼎腹部饕餮纹侧的倒立夔纹

饕餮纹侧通常以夔纹来填空，是商后期以及西周早期青铜器的一个特点，其中的绝大多数夔纹是倒立的形态，只有妇好鼎和射女鼎等极个别的例子中夔纹是平身的姿式，这是殷墟二期特有的一种设计样式。下面分析在科学发掘出土铜器中，倒立夔纹与饕餮纹的组合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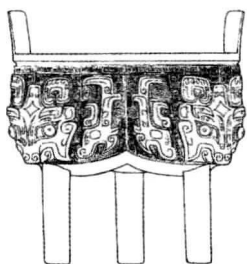


图 2-1 安阳郭西
M160: 123 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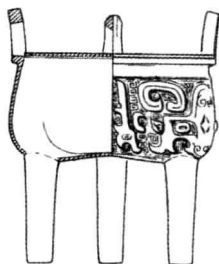


图 2-2 鹿邑太清宫
M1: 78 鼎



图 2-3 宝鸡纸坊头
M1: 7 方座簋

根据考古发掘出土的夔纹铜器进行统计，就青铜器总的纹饰情况看，在饕餮纹侧倒立的夔纹有直体上弯尾（30 例；图 2-1）、直体下摆尾（37 例；图 2-2）、折体摆尾（6 例；图 2-3）、直体带横羽（3 例；图 2-4）、直体下弯尾（1 例；图 2-5）五类，其中亚吴卣和花东 M54: 84 方尊同时出现直体上弯尾和直体下摆尾夔纹，故实际为 75 器。直体下摆尾的夔纹在饕餮纹侧出现频率最高，大约能占到 47%，直体上弯尾的夔纹所占比例为 40%，其余依次是折体摆尾、直体带横羽和直体下弯尾，合起来才达到 13%。饕餮纹侧折体下摆尾夔纹多出现在方座

^① 苏辉《中原地区商西周青铜器夔纹研究》，清华大学 2010 年博士学位论文。



图 2-4 宝鸡纸坊头
M1:7 方座簋



图 2-5 灵石旌介
M1:35 簋腹部拓片

簋和圆尊，前者如利簋、天亡簋、宝鸡纸坊头 M1:7 簋；后者的例子是安阳刘家庄北 M1046:7 尊和涇阳高家堡 M4:13 父癸尊；此外就是妇好墓出土的饗饗纹觥。殷人和周人都有这样的青铜器，可见是一种共同的设计习惯。至于灵石旌介 M1:35 簋上的直体下弯尾夔纹，更是极其罕见，目前看可以推断为一种带有地方特色的夔纹。有了前面数据统计的背景，再来看分档鼎的腹部饗饗纹侧倒立夔纹的情况，选取的铜器分别来自安阳殷墟、罗山莽张、定州北庄子、滕州前掌大、鹿邑太清宫、宝鸡纸坊头和竹园沟等遗址墓葬：

直体上弯尾：花东 M54:181、大司空东南 M303:82/104、孝南 M1713:27、亚鱼分档鼎、郭西 M160:123/135、郭南 M13:1、莽张 M28:11、纸坊头 M1:3、竹园沟 M13:18、定州北庄子 M95:1、前掌大 M38:53/76 和 M11:88/89 等分档鼎。

直体下摆尾的有 7 件，但只见于两处遗址，分别是花东 M54:166/167 和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6、78、80、91、185）分档鼎。

按件数来算，两者的比例是 16:7，但如果按照墓地，即同一个墓中所出只算一例的话，这个比例就变成了 6:1。

再参照传世铜器中的情况，以《美集录》著录的分档鼎为例^①，其中有 16 件饰夔纹，饗饗纹侧倒立夔纹的分档鼎共 11 件，为 A42—A52，无一例外都是直体上弯尾夔纹。

由此可以推断，分档鼎腹部饗饗纹侧配直体上弯尾夔纹是常例，出现直体下摆尾的为变例。上述鼎从时代来看，均落在商晚期和西周早期这个时段，其中又以前者为最流行。若根据地域或族属的角度来分析，安阳出土的占大多数，其他无论是陕西以内还是其外部，都没有发现属于周人的器物。莽张、定州北庄子和鹿邑太清宫都是商系的遗址，前掌大为任姓薛国墓地，纸坊头和竹园沟虽在周人的传统属地宝鸡，但在族源上却与周判然有别。传世的此类分档鼎是否有周人遗

① 陈梦家《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青铜器集录》，科学出版社，1962 年版。本文简称《美集录》。

物, 不得而知, 但至少从考古发掘的结果看, 周人的分裆鼎在饗饗纹侧没有出现倒立直体上弯尾和下摆尾两种夔纹。希望今后有更多的材料可以验证此说。

二 斧钺上的顾首卷体盘尾夔纹

斧钺在商周是权力与身份的象征, 因而在器体常有特殊的纹样或装饰, 以示与普通兵器的区别。

《河南文物精华·藏品卷》著录一件青铜钺^①(图3-1), 为辉县褚邱出土, 但非科学考古发掘, 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②。阑侧两长条形穿, 内部有一圆穿, 并饰正面的饗饗, 钺面呈束腰的梯形, 透雕的顾首卷体盘尾夔纹嵌于其上。

饰有同样夔纹的还有10件铜钺, 一件是1965年陕西绥德塬头村窖穴出土的乡威^③(图3-3), 著录在《神韵》^④83, 阑侧两穿, 一穿已残, 戚面接近正方形, 内部圆穿上有族氏铭文“乡”, 似两人向簋对坐, 一人伸手取食, 另一人仍垂手不动, 其他器物上未见有同样的族氏铭文^⑤。1975年河北武安赵窑M10出土的一件钺^⑥(图3-4), 内部也是正面的饗饗, 四面围有边框。

以上是考古发掘得到的, 另外8件则是传世品。《商周金文录遗》603钺(图3-5)除了内部族氏铭文是两片刀形立羽夹着一个“贾”字外^⑦, 别的特征和武安的这件几乎一模一样。内部族氏仅见于河南罗山天湖M11:25商代戈^⑧(图3-6), 这暗示有可能《录遗》的贾钺就是从罗山天湖墓地流失出去的。M11属殷墟二期偏晚, 比妇好墓略迟, 因此, 贾钺也应该是殷墟时期的器物。

① 河南省文物管理局编《河南文物精华·藏品卷》(本文简称《豫精》), 文心出版社, 1999年版, 第24页。

② 杨清秀《新乡馆藏辉县出土的几组青铜器》, 《平原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③ 黑光等《陕西绥德塬头村发现一批窖藏商代铜器》, 《文物》1975年第2期。

④ 冀东山、梁彦民主编《神韵与辉煌——陕西历史博物馆国宝鉴赏·青铜器卷》(本文简称《神韵》), 三秦出版社, 2006年版。

⑤ 何景成《商周青铜器族氏铭文研究》, 齐鲁书社, 2009年版, 第497页。

⑥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文化学院《武安赵窑遗址发掘报告》, 《考古学报》1992年第3期。彩图见《邯精》13。

⑦ 于省吾编著《商周金文录遗》(本文简称《录遗》), 中华书局, 1993年版。

⑧ 河南省信阳市地区文管会、河南省罗山县文化馆《罗山天湖商周墓》, 《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



图 3-1
辉县褚邱夔纹钺



图 3-2
褚邱钺拓片



图 3-3
乡咸



图 3-4
赵窑 M10 钺



图 3-5
《录遗》贾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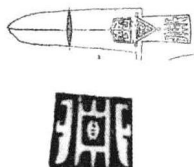


图 3-6
罗山天湖 M11:25
戈及内部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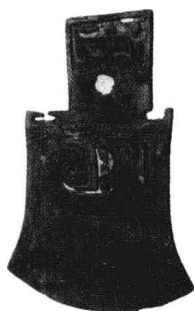


图 3-7
旧金山藏夔纹钺



图 3-8
《古兵》夔纹钺（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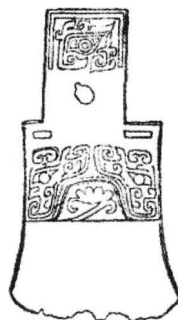


图 3-9 罗山
天湖 M28:19 钺



图 3-10
《古兵》夔纹钺（二）



图 3-11 《殷周金
文集成》11748 钺



图 3-12 法国吉美
博物馆藏夔纹钺

美国旧金山艺术博物馆藏了一件夔纹钺^① (图3-7), 阑侧两穿已中断, 顾首夔纹与上述几件铜钺无别, 只是内部纹饰较为独特, 中心为“臣”字形目纹, 环绕云状羽纹, 外部三边单划出边框。罗越所编的《中国铜器时代古兵》附图7、8收入两件^②, 器体夔纹较为一致, 前者 (图3-8) 阑部较宽, 内部四周有索状正方形边框, 里面饰变形兽纹, 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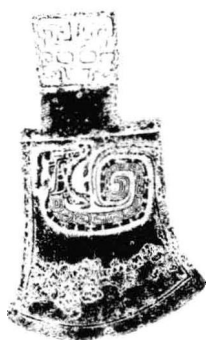


图3-13
上博夔纹钺



图3-14
克利夫兰藏夔纹钺

实与旧金山藏钺内部纹饰类同, 也是羽状内包目纹, 同样的造型可举出罗山天湖M28:19 钺的内部纹饰 (图3-9), 和旧金山藏钺的内部完全一致, 或许也是同一地域的产物; 后者 (图3-10) 器体的长宽比例略近于《录遗》的贾钺, 其内部纹饰与《古兵》的另一件近似, 惟其他部位略有差异, 如内部纹饰四边均有边框, 边框以外没有圆形穿, 大概是以中空的目纹为穿, 这一点与其他各器均不同。《殷周金文集成》11748 著录一件同样形制的钺^③ (图3-11), 藏于瑞典斯德哥尔摩的远东古物博物馆, 内上铭文“亚父”, 亚形两边还有线条化的倒立顾首小夔纹, 钺体较宽。法国吉美博物馆收藏的夔纹钺^④ (图3-12), 钺体较宽, 这一点与褚邱的钺相似, 内上纹饰与《古兵》的两件类同。从拓片 (图3-2) 看, 褚邱钺的顾首夔纹张大的双唇似乎没有利齿, 但参照《豫精》的彩图, 可知确实有, 只是利牙的锋尖铸得很薄, 没有拓出。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 (图3-13), 著录在陈佩芬先生主编的《夏商周青铜器研究·夏商卷》^⑤, 内上的饕餮纹较为抽象

① 台北故宫博物院《海外遗珍·铜器》, 第61器, 台北故宫博物院, 1985年版。

② Max Loehr (罗越), *Chinese Bronze Age Weapons: The Werner Jonnings' Collection in the Chines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中国铜器时代古兵: 北京故宫博物院杨宁史旧藏三代青铜兵器图录》, 本文简称《古兵》),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London: Geoffrey Cumberled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释文》, 香港中文大学, 2001年版, 第684页。此器承王世民先生指示, 谨致谢忱!

④ 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彩图6,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年版。

⑤ 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夏商卷》, 第189器,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年版。

化。最后一件为美国克利夫兰艺术馆藏品^①（图3-14），内部为带有边框的饕餮纹，与褚邱所出钺非常接近，不过内部穿口径很小，这和瑞典、法国上博所藏的夔纹钺一样。

乡威、褚邱和赵窑的夔纹钺都是出自商代晚期的遗存^②，器物年代也多在殷墟后期，传世的几件也应是商代后期的遗物，郭家庄 M190:7 铜片有顾首的盘尾夔纹^③，与铜钺上的盘尾夔纹较为类似，在时间上也非常接近。只是《录遗》的贾钺已不知去向，无法得见原器。同时，有明确出土的几件钺都来自陕西绥德、河南褚邱和罗山天湖、河北赵窑这些商朝重要的方国据点，它们在政治、文化上同统治中心安阳保持非常紧密的联系。如此看来，传世的其他几件夔纹钺可能也来自别的一些方国遗址，换言之，能够拥有这种夔纹钺的地方都是当时重要的军事政治中心^④。《史记·殷本纪》：“纣乃……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文王因此成为西方诸侯之长，获得征伐诸侯并予以处罚的权力，就是《礼记·王制》提到的“诸侯赐弓矢而后征，赐钺而后杀”。

对比这 11 件铜器，不难发现一些共同的特点：内与阑的结合部大多并不在阑的中点，而是偏向夔纹头部的位置，这点乡威和《古兵》8 钺不是很明显，《古兵》7 钺则正好相反；全是在器体的中心部位装饰顾首卷体盘尾夔纹，双唇利牙交错，并且都是带兽耳，无角，龙身上也都显现鳞片。各个夔纹几乎如出一手。



图 4-1
殷墟出土商玺印



图 4-2
《玺印》6 商玺印



图 4-3
《玺印》3 田字格印



图 4-4
《大全》6 肖形印

这些钺最大的不同在内部的装饰，可分 3 种情况：（1）有族氏铭文，如乡威、亚父钺和贾钺；（2）有饕餮纹，如赵窑、褚邱和上博的钺；（3）还有变形的

① 台北故宫博物院《海外遗珍·铜器续》，第 79 器，台北故宫博物院，1988 年版。

② 唐云明《试论河北商代文化及相关的问题》，收入氏著《唐云明考古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 年版。杨锡璋、高炜主编《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 383～384 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1992 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58 页。

④ 杨锡璋、杨宝成《商代的青铜钺》，《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 年版。

兽纹,中心为臣字形目纹,四面连接横羽和立羽,吉美博物馆和《古兵》的两件钺都是如此,构图与罗山天湖 M28:19 钺的内部纹饰类同。(2)和(3)类型均有三器,这6件钺内部的纹饰在四周都有边框,很像是用玺印在模子上压制出来的。可资对比的是《中国书法全集·先秦玺印》第5印(图4-1),系1998年在安阳殷墟出土,也是迄今唯一有考古记录的商代玺印,与该书第6号的商代印(图4-2)均作正方形,印面都为简化的饕餮纹^①,时代相近的肖形印与钺内部纹饰形态的关系的确值得深思;书中第3枚是传出安阳殷墟的田字格印(图4-3),李学勤先生释文作“刊旬抑埴”^②,其中“旬”的字形与上述第3种内部纹饰相似,和《中国肖形印大全》第6印(图4-4)的纹饰也有可比之处^③。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钺内部的纹饰与商代玺印之间应该存在某种关联,很有可能就是玺印在铜钺内模上抑埴留下的杰作。卷体盘尾夔纹与铜钺更是毋庸置疑具有非常密切的对应关系。

三 其他

在商后期和西周早期的车马器上常常可见到夔纹,但只有两种类型:在圆体饰件的顶面作卷体衔尾夔纹,如軎饰和车害;其他都是以前首曲体上弯尾的形体出现,整齐划一。

在别的一些器类上也能看到圆雕的曲体上弯尾夔形,其中最典型的是在青铜刀的柄部。刘一曼先生在《殷墟青铜刀》一文中举出了安阳殷墟大司空村 M292(图5-1)、白家坟 M22(图5-2)出土的两例,并提到这种夔形作柄的刀包括传世品在内也不会超过10件^④。传世的器物中,民国时代在殷墟小屯的墓葬出土了两把同型夔柄刀,著录在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的论著中(图5-8)^⑤。殷墟以外也有同样的用法,如滕州前掌大 M38:70 刀(图5-3),刀面与殷墟的两把类似,只是脊背上不见一排勾棱,柄部也是前首开口的曲体上弯尾夔形,带瓶状角,不

① 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全集》第92卷《先秦玺印卷》(本文简称《玺印》),荣宝斋出版社,2003年版。

② 李学勤《试说传出殷墟的田字格玺》,《中国书法》2001年第6期。

③ 温廷宽编《中国肖形印大全》(本文简称《大全》),第6印,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④ 刘一曼《殷墟青铜刀》,《考古》1993年第2期。

⑤ W. C. White (怀履光), *Bronze Culture of Ancient China—An Archaeological Study of Bronze Objects from Northern Honan, dating from about 1400 B. C. - 771 B. C.*, Plate. XXVI. 1, 2, Museum Studies No. 5,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56. 本文此图转引自吕学明《中国北方地区出土的先秦时期铜刀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0页。